

# 现代俄罗斯文明起源的法兰西因素： 18世纪俄译法国流行文本考\*

林精华

**【内容提要】** 俄国自视为欧洲国家，远不只是有部分国土位于乌拉尔山脉以西、很早就接受了基督教，而是从彼得一世改革不久便加大引进现代欧洲文明，尤其是现代法兰西文明，试图以此改造传统的斯拉夫文明结构、推动世俗化进程。对法国文明的引入是从翻译开始的，体制内外的各种海归或懂外语者皆热心于译介欧洲尤其是法国流行的现代文本，使伏尔泰和卢梭等启蒙主义作品与其他畅销书一道，源源不断进入俄国，甚至通过法文去筛选和引进英国或德国等国的流行之作，由此形成崇法风尚。就这样，俄国实现了从教会主导的国家向世俗化国家的迅速转换，进入了近代文明阶段。但是因书刊审查制度筛检，翻译并未使俄国真正融入欧洲，而欧洲面对的俄国仍是不能共享现代文明的他者。

**【关键词】** 18世纪 俄罗斯帝国 翻译 欧洲流行文学 法语文本

**【作者简介】**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俄国著名翻译家和文学家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在遗作《杂忆琐谈》(1869)中称，“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并非如某些人所以为的那样差和贫瘠。它并非色调单一，而是硕果不少，在当时就被大家所利用和享受了，如许多翻译作品就如此。在1770年代，我们就翻译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老鼠战争》，阿那克里翁的《诗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只是随着文字变革，这些译本才逐渐风光不再，从卡拉姆津时代开始，那些掌握新俄语的读者，阅读这类旧字母拼写的译作变得吃力起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剑桥俄罗斯文学（九卷本）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9）阶段性成果，得到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斯拉夫语言系访学项目支持。

来。“18 世纪懂外语的人不多，在首都尚未有图书馆，读者若要阅读则需花费不菲，尚未有刊载完整的长篇小说的大型杂志，但单行本译作很多、读者群很大”，当时刊行的图书，如《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吉尔布拉斯》《堂吉河德》《鲁滨逊克鲁索》……伏尔泰作品集、《新爱洛依丝》等，是后来每个图书馆必须收藏的。“在上个世纪末，我们就满怀享受地阅读着伏尔泰的全部译作”<sup>①</sup>。此说在官拜司法部长的伊凡·德米特里耶夫这位翻译家和科学院院士（1797）那里得到证实：他译过《靠面包市场生存的哲学家》，声称“1788 年在参加和瑞典作战的过程中还翻译《新爱洛依丝》中的书信部分”<sup>②</sup>。当事者的生动记忆，颠覆了 19 世纪后期或苏联学者所建构的各种去欧洲化的俄国文化史观或文学史观，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等经典在其论述中如空穴来风，他们表达对俄罗斯的深切认同，或对俄罗斯问题的深刻叙述，变成了其声望所在，而不再追溯他们是如何成长为经典作家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疑惑上述所及的情形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18 世纪俄国有哪些译者，他们在怎样机制的激励下，翻译了哪些作品？这些译作和其原作在欧洲境遇相比，在俄国又是怎样的情形？更重要的是，18 世纪这样大量翻译欧洲经典或流行作品，为何俄国终究没能变成欧洲一部分或被欧洲接纳？以及俄国与去欧洲化的文学史建构有怎样的关系？



1697 ~ 1698 年，彼得一世亲率约 250 人，赴荷兰、英格兰、普鲁士等实地考察造船业、议会政治、市政管理、教育和科技发展等。而欧洲此时正处于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加速降低罗马教会影响力、促进现代文明加速兴起之大势中：马丁·路德肇始的宗教改革得到德意志世俗权力的支持，很快促成了欧洲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浪潮，如瑞典和丹麦相继跟进（1527 年瑞典国王推动宗教改革，包括没收教会财产、限制主教权力，1544 年确定瑞典为信仰新教之国；1536 年丹麦进行宗教改革，建立路德宗），英格兰出现钦定本《詹姆斯一世圣经》（1611）并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安立甘宗，加尔文宗的出现又推动苏格兰基督教

<sup>①</sup> Дмитриев М. Московские элегии: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Мелочи из запаса моей памяти. М.: Мос. рабочий, 1985, С. 49, 173 – 175.

<sup>②</sup> Дмитриев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омах. СПб.: Издание Евг. Евдокимова, 1893, Т. 2. С. 33.

会脱离罗马教廷（建立苏格兰长老会），也推动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1598年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新教徒信仰自由）等。罗马教廷最终不得不放弃坚持了千余年的权力，把希伯来文或拉丁文或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各民族语言，不再被曲解为用“方言”表达“圣言”之异端行为。《圣经》和基督教的地方化和世俗化之势，伴随着近代科学兴起，推动了17世纪欧洲巴洛克艺术潮流——彰显欧洲宫廷美学的文学艺术，替代了教会主导下的基督教会的审美。进而，使用民族语言翻译和阅读《圣经》，不单单是建构了信徒对基督教信仰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促成信徒对民族国家之认同感，出版业逐渐蔚然成风——不必再经罗马教会许可而自行用自己的语言刊印《圣经》<sup>①</sup>。伴随这个过程的是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等日益摆脱罗马教廷的城市，也就自主地刊印市民所需的世俗化书籍，文人创作无需经过教会，培育出自身的市民化美学趣味，这些反过来提高了欧洲各国的城市化质量，如18世纪英国出版了千余种小说——多是倡导个人主体性的情爱小说、成长小说、历险记等，现代美学观念由此而起。

相较于此，在教会支持下才完成公国统一的沙俄自然成为正教国家，彰显教会之伟大乃情在理中之举。1598年莫斯科教会成为第五个独立的东正教宗主教区，自此用教会斯拉夫语书写的历史或宗教故事文本大胆吸收巴洛克美学，强化王权的宏大叙事话语之魅力，出现利哈哈夫院士所说的情形，“俄罗斯巴洛克风格不只是17世纪的一种简单艺术样式，还是时代的重要潮流”，它渗入建筑、圣像画和世俗文学中<sup>②</sup>。17世纪俄国皇室虽然把欧洲宫廷的巴洛克风格嫁接过来，却未促进社会加速世俗化、市民化；即便17世纪正教会推动的礼拜仪式改革，尤其是彼得一世改革中包括把教会纳入国家事务管理体制，但方式和效果终究不同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进而造成到18世纪中叶帝俄只有8%的人居住在城市（含郊区居民），甚至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城市化水平也不高<sup>③</sup>。据季霍米罗夫和萨哈罗夫所言，在蒙古入侵之前，基辅罗斯及其后公国时期有城镇300个左右，其中134个是在12世纪命名的，1240年到来之前又命名了47个；在蒙古统治时期

<sup>①</sup> Bruce M. Metzger, *The Bible in Translation*. MI: Baker Academic, 2001; Jonathan Sheehan, *The Enlightenment Bible: Translation, Scholarship, Culture*.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p>②</sup> Лихачев Д. 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 – XV II веков. СПб.: Наука, 1998, С. 130 – 200.

<sup>③</sup> Кабузан В. М. Некотор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и 18 – начало 19 веков //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 Т. 11. 1963, С. 153 – 195.

罗斯有城镇 358 个，到 15 世纪著名的只有 27 个。即便鞑靼蒙古人统治结束后各城镇商业繁荣程度有所增加，但城镇规模小、市政水平低，莫斯科亦然——1272 年丹尼尔成为莫斯科大公后，仍坚持以教会和王权为中心改建莫斯科，15 世纪末莫斯科人口仅 5~10 万、面积 1 900 公顷；伊凡雷帝统一各公国之后，莫斯科发展依旧有限。同样，期间下诺夫哥罗德仅 310 公顷，到 16 世纪斯摩棱斯克仅 190 公顷。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相较于欧洲，俄国城市化水平未获得长足进展，如据 1708、1719、1727 年地方法律所规定的城市居民点统计资料，以及 1741、1764、1776 年正教事务管理局对信徒洗礼情况统计的数据，俄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尤其是 1775~1786 年地方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增设 216 个城市，到 1856 年生活在大城市的居民达 1/3，不足 16% 的居民生活在小城镇，但这些城市人口有限、面积很小<sup>①</sup>。

彼得一世虽然加速推动俄国世俗化，1687 年接纳著名诗人西梅昂·波洛茨基之倡议，创立“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Славяно-Греко-Латин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1687），但这所堪称俄国的首座大学，其主要目标仍是为正教会培养《圣经》翻译、基督教传播和教会内部管理人才。彼得一世考察欧洲之后，彼得堡创办首份俄国报纸《公报》，到 1704 年每周发行量仅百份，而当时英格兰有报纸 9 份，每周出版 2~6 次，销售量达 4.4 万份<sup>②</sup>。1700~1725 年俄国出版图书 1 312 种，更多的是法律、告示和规章制度等实用类的，文学类才 3 种，宗教类 308 种（占总数的 23.5%）<sup>③</sup>，包括 1708 年都主教马克西莫维奇（Иоанн Максимович）把德国神学家格哈德（John Gerhard）《圣思录》译成《需坚信的神学思想》，在荷兰学习七年且通德文和法文的赫鲁晓夫（А. Хрущев）于 1719 年把德国神学家肯佩斯（Thomas Kempis）之作《追寻基督》译成《慰藉灵魂，又名追寻耶稣基督》等。正因如此，彼得一世认为，相较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水平，沙俄简直是处在“无知的黑暗”中！

正是意识到与欧洲之间有如此明显差距，彼得一世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便不断加大世俗化和城市化改革力度。1702 年 12 月 16 日，他御令创办第一份俄国

① Тиромиров М. Н. Древнерусские города. М.: Гос. изд. - во полит. лит. - ры., 1956, С. 43; Сахаров А. М. Город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Руси 14-15 веков. М.: МГУ, 1959, С. 128.

② James Sutherland, "The Circulation of Newspapers and Literary Periodicals 1700-1730", in *Library*, No 15 (1943), pp. 111-116.

③ Gary 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1700-18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5.

公开刊行的报纸《公报》（Ведомость，1702～1728），向民众宣传科学技术、政府政策、国家建设，介绍欧洲的文化、思想和科技等。1710年御令创造简易的新字体，即用现代俄语代替书写复杂的教会斯拉夫字母，方便印刷和国民阅读。1724年1月28日，参政院会议通过建立科学院的计划，这一天后来被视为俄国科学院成立之日。虽然直到彼得一世去世后，受聘的西欧学者们才陆续到齐，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由此正式运营起来，但该院很快就建立附属中学和小学、印刷厂。叶卡捷琳娜大帝鼓励私人 and 国企创办杂志、印刷厂/所，她本人甚至于1769年创办杂志《各式各样的东西》（Всякая всячина）、1783年御令实施出版自由法，带动了民营杂志和图书出版的繁荣。具体来说，赫拉斯科夫在任莫斯科大学校长之际创办启蒙性杂志《有益的娱乐》（1760～1762）和《自由时刻》（1763），著名作家楚尔科夫（М. Чулков）创办《五花八门》（И то се）和《诗坛酷评者》（Парнасский щепетильник），莫斯科大学教师鲁班（В. Рубан）创办《无所不在》（Ни то и се，1769）、《勤劳的蚂蚁》（Трудолюбивый муравей，1778）、《古风与革新》（Старина и новизна，1772～1773）等讽刺杂志，退役军人和翻译家图佐夫（В. В. Тузов）创办讽刺杂志《日工，又名每日读物》（Поденщина，или ежедневные издания，1769），彼得堡陆军学校外语教师泰伊里斯（И. Тейльс）和鲁缅采夫（И. Румянцев）创办《有益的消遣》（Полезное с приятным，1769），著名作家费多尔·艾明创办《地狱邮局》（Адская почта，1769），其儿子尼古拉·艾明（Н. Эмин）创办《大杂烩》（Мешанина，1773）；著名出版商诺维科夫（Н. Новиков）创办《雄峰》（Трутень，1769～1770）、《咬舌者》（Пустомеля，1770）、《写生画家》（Живописец，1772～1773）、《钱包》（Кошелек，1774）等讽刺性周刊以及《晨光》（Утренний свет，1780）、《莫斯科月刊》（Московское ежемесячные издание，1781）等通俗杂志；1794年《莫斯科公报》出版周二报《寓教于乐的消遣时光》（Приятное и полезное препровождение времени），等等。相应的，印刷所不断增加，如莫斯科州和弗拉基米尔州出现许多小型印刷所，到1760年，莫斯科大学印刷所和水兵部（1752）、步兵部（1757）、工程兵部（1765）等合作，扩展到11家，雇员达70～80名，到1760年代中期每年出书达40种，此后出版量递增；科学院印刷所历尽艰辛，到1750年代末扩展到11家，到1770年代扩展到17家。此外，军事学院、炮兵部等附属印刷所在1756～1775年间也出版不少畅销读物。并且，这些印刷所重点刊行启蒙时代的流行之作，如赫拉斯科夫的《卡德姆和加尔莫尼亚》（1789）和

《波利多尔，卡德姆和加尔莫尼亚之子》(1794)等<sup>①</sup>。这些出版机构和杂志经营者，瞄准图书市场，如 1756~1779 年莫斯科大学印刷所刊行千种图书，还出版《朝霞》《晚霞》和《经济杂志》等刊物，以此为依托的诺维科夫由此成为著名出版家。18 世纪 70~90 年代《莫斯科新闻》销售量从每期 500 份涨到四五千份，《彼得堡新闻》从 18 世纪 60 年代 600~1 200 份到 90 年代涨至 25 000 份<sup>②</sup>。1782~1786 年，因刊行《俄罗斯故事集》而声望赫赫的文学家廖夫辛（В. Лёвшин）和诺维科夫主编的通俗杂志《城乡图书馆》合作。1767 年当局成立著作委员会，委员包括贵族、商人、市民和农民等，以图加速促使国民知晓现代文明，并参与这样的生活。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出版机构率先兴盛起来并辐射到其他城市，有关现代军事、造船、建筑、自然科学等著述被大量翻译、印行，出现了著名文学史家古科夫斯基所说的情形，“到 18 世纪中期，俄罗斯图书更多的是在商业氛围，而不是在贵族气氛中刊行和流通的”，连外省各种有文化的商人、神父皆热衷于阅读悲剧、讽刺性杂志、译作，刊行商人趣味之作的机构多达 3~5 个<sup>③</sup>。

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欧洲文化变得日趋重要。1712 年彼得一世御令枢密院翻译欧洲国家的法律文本，继而鼓励翻译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哲学、教育、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文献。由此，罗蒙诺索夫翻译法国神学家费奈隆神学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信札》(1713)。而这种情形得到教会的广泛支持，如至圣主教公会著名神学家和活动家普罗科波维奇就声称，“理性的人、民族，并不以借用其他人、异民族的善而羞耻；对没有理性的、有糟糕缺点的其他民族，哪怕是善的，也不需要接受其文化”<sup>④</sup>。1735 年，在科学院秘书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倡议下，翻译家每周三上午、周六下午聚会讨论翻译计划、审读译稿和互相校对等。接着，科学院内部创建了首个翻译机构“俄国人聚会”（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又名“翻译家聚会（Собрание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该机构设立当代重要作家作品、古典作家经典、历史和地理、物理—数学、自然科学等翻译小组，存续了 8 年（1743

① Gary 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1700 - 1800*. pp. 76 - 89.

② Городецкий Б. (ред), *Вопросы из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 - XX веков*. М.: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а, 1958, С. 202 - 203.

③ Гуковский Г.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8 века*. С.: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3, С. 179

④ Феофан Прокопович, *Прада воли монарей*. СПб, 1722, С. 22

年结束)<sup>①</sup>。1768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创建“外文书俄译促进会”(Собрание, старающееся о перевод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книги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язык),科学院翻译者成为促进会初期的主力军,该机构存续期间共发表36位翻译家的112种作品(173卷),其中28种剧作被搬上舞台<sup>②</sup>。由科学院院长达什科娃(Е. Дашкова)公爵夫人倡议,1790年科学院教授普罗塔索夫(А. Протасов)成立“翻译局(Переводческ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以替代“翻译家聚会”,进一步促进对翻译的重视和规范。相应的,体制外翻译也日趋活跃,如诺维科夫主持的《晨光》《对话公民》等杂志就聚集了大批翻译家。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欧洲流行文学作品进入俄国,并且这类翻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读者需求的商业性动力、翻译风格的多元化<sup>③</sup>。在这种情形下,彼得一世最初虽然对法国文学的兴致不是很高,更重视社会治理经验、科学技术进步、建筑风格和绘画成就等,但客观上累积了对欧洲文学艺术的兴致。在他去世之后,加大引进欧洲流行文本已然势不可挡。1773年“外文书俄译促进”获独立出版资质,到1783年超过110位人士参与其中,如科学院第一批院士和数学家鲁莫夫斯基(С. Румовский)、科学院院士和作家波格丹诺维奇(И. Богданович)、古典主义剧作家科尼亚日宁(Я. Княжнин)、教育家科兹里斯基(Я. Козельский)以及思想家拉吉舍夫、罗蒙诺索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著名政论家波索什科夫(И. Посошков)、科学院院士苏马罗科夫、诗人和剧作家沃尔科夫(Ф. Волков)、天文学家波波夫(Н. Попов)等,他们使得“孟德斯鸠、伏尔泰、百科全书派以及斯威夫特、塔索等作家作品得到大量翻译,这些译作也得到了该机构的高度评价”<sup>④</sup>。正是在翻译文学的启示下,著名诗人和剧作家赫拉斯科夫创作了以六音步古典主义诗歌为标准的英雄长诗《俄国不可战胜》(1779)——歌颂伊凡雷帝攻克喀山,以及政治哲学小说《鲁马·波穆皮里,又名繁荣昌盛的罗马》(1768)和《卡迪姆与加尔莫尼亚》(1789)等享有盛誉之作。

可是,彼得一世以来俄国所面对并希望融入的欧洲正处于急剧变化时期:启

① Пекарский П. Известия о рус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одной лютеранской книги во времена Петра I // Зап. Мип. АН, 1864, Т. 5, С. 638.

② Семенов В. П. Собрание старающееся о перевод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книг, учрежденное Екатериной II: 1768 – 1783; Историко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Пб.: тип. Сириус, 1913, С. 32 – 85.

③ G. Marker,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the Origin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Russia*. pp. 152 – 183.

④ Семенов В. И. Собрание старающееся о перевод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книг, учрежденное Екатериной II, 1768 – 1783 гг. Историко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 27.

蒙运动在法国演变成大革命，欧洲版图被改变；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于1707年合并为大不列颠，英国得以迅速推动工业革命，以市场经济和殖民主义力量推广资本主义经济而开始改变世界构成，很快与帝俄正面交锋；德国对法国社会政治制度革命和英国经济变革产生了激烈反应，另建一套关于普适性的概念。在这个新欧洲替代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等老欧洲帝国的18世纪，俄国注意到当时欧洲文化的分化：一方面各国宫廷推崇世俗化，试图从根本上摆脱罗马教廷之影响；另一方面强调王权至高无上的古典主义悲剧和颂诗、巴洛克艺术，对公众由服从教会转向认同世俗政权产生积极作用。由此，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康捷米尔等支持翻译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古典主义颂诗，并创作了大量歌颂皇帝或俄罗斯帝国的诗歌，深得一代代体制化的官方文学史家赞誉。同样重要的是，彼得时代激发了文化生活领域中富有成效的热情，按欧洲模式创建了俄国第一批公众剧院。在俄国欧化史或彼得大帝以来文化形成史过程中，这些剧院的成熟起了关键性作用<sup>①</sup>。的确，1702年彼得一世御令在红场建立公共剧院，1720年在莫斯科戏剧广场建成歌剧院，1756年彼得堡建立公众剧院、莫斯科大学建立附属剧院并很快向公众开放，177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御令在彼得堡建立国立公众剧院，1780年彼得罗夫剧院竣工……进而，城市化进程促成市民常去教堂、欣赏古典主义艺术之外，还去剧院看欧洲戏剧，这一当时上流社会和部分市民的重要审美活动，成为俄国面向欧洲开放的关键性步骤。也就是说，“高雅艺术”促使那些商人痴迷于贵族化之路，并视之为改变社会地位的最佳出路<sup>②</sup>。

与此同时，帝俄官方采用瑞典政府运作模式，设立各专门委员会，如贸易委员会，鼓励国内外商人在俄国港口城市经商，以增加税收。1721年10月16日，彼得一世亲临枢密院指示，要求大部分外贸商品经由彼得堡出口，这就使彼得堡日趋成为欧化的城市。然而，帝俄当局看到，城市化和世俗化在欧洲导致市民思想活跃、审美多元化，日益危及社会正统价值观和秩序。而18世纪俄国急剧扩张，面临着如何有效治理问题。对这样的欧洲文化及其引入，皇室和当局把教会的宗教审查制度转化为书报刊审查制度，试图阻止世俗化的欧洲文化输入。彼得一世于1701年御令禁止利用书面文字发表反政府的言论，1720年10月御令不得

<sup>①</sup> Гуковский Г. и Десницкий Ф.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 3 (литература 18 века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М. / Л.: изд. Акаде. Наука СССР, 1941, С. 97.

<sup>②</sup> Щербатов М. М.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ущербе торговле, происходящем выхождением великого числа купцов в дворяне и в офицеры. (Сочинение, Т. 1. СПб. 1896).



出版未经审查的宗教书籍并对世俗出版物进行审查，1721年3月20日枢密院下令禁止出售未经主教公会审查过的宗教书籍和绘画。由主教公会负责宗教审查、科学院负责世俗审查的制度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被强化。1763年9月御令加强对进口图书审查的功能，在圣彼得堡具体由科学院执行，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大学执行，在外省由所在州的著名大学或中学执行，没有学校的地区由地方行政长官执行，以防启蒙运动文化不利于帝国治理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以法律形式实施的书刊审查没有因西化程度的增加而减弱。1771年3月1日，叶卡捷琳娜大帝御令颁布俄国第一部图书出版法，1783年1月15日御令监控自由印刷物；1796年继位不久的保罗就御令颁布新书刊审查法，并在1797年年底和1800年4月改革这项法律，将监管范围扩大；1804年亚历山大一世颁布书刊审查条例，宗教检查和世俗监控范围扩大到所有出版物，继续禁止出售未经审查的任何出版物，建立由大学教授和高学位人士组成专业审查委员会，加强帝俄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对高校教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的监管，由此延伸出喀山神学院建立负责监管圣城喀山宗教宣传委员会（1817）、基辅神学院宗教审查委员会（1819）等。在这一名义上为确保帝俄安全的法律演化为对来自欧洲思想的监控，确保了那些剧院能引进欧洲正统的高雅艺术，如1750~1800年间彼得堡和莫斯科主要剧院节目单显示，法、德、意、西等国戏剧占绝对重要位置，但欧洲争议颇多的剧作则不在其列<sup>①</sup>，也使许多不符合正统诗学的文学作品未能刊行，如《帕赫林村的卡梅金故事》这类以农民为主人公之作，虽然得到底层读者喜爱<sup>②</sup>，但只以手抄本方式流通。因此，18世纪俄国对引进欧洲流行文学，一开始就处于矛盾中：当局意识到引进当代欧洲文学的重要性，又意图隔绝这类文本所表达的不适合于俄罗斯帝国的思想。

吊诡的是，在这样矛盾的情势中，城市化大势却不断改变着官方对翻译实践的预期。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彼得堡每年人口净增超过4000人（此后每年增速超过15000人），并且经济增速不断改变着市民质量<sup>③</sup>。相应的，体制外的美学应运而生，甚至当局支持的艺术政策也趋于市民化。“在彼得一世时

<sup>①</sup> История драм театра. Т. 1, М., 1972 С. 435 – 472; П. Мороз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театра. Т. 1. СПб., 1889, С. 198 – 294.

<sup>②</sup> Гуковский Г. и Десницкий В. А. ( ред.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0 томах. Т. IV.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I века. Ч. 2. М. / Л.: АН СССР. 1947, С. 311.

<sup>③</sup> James H. Bate, “Between Old and New: St. Petersburg in the Late Imperial Er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ed. by Michael H. Ham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1.

代，翻译欧洲畅销书，整体上虽然尚未水到渠成，却不意味着不翻译小说”<sup>①</sup>，并且其后翻译世俗文学呈加速增长的趋势，戏剧翻译日趋世俗化，越来越不限于古典主义悲剧，如 1734 年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从法文翻译的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Salvi Antonio）《工商贵族》、别里穆罗（A. Belimuro）《自恋，又名水仙》、法国剧作家莫里哀《无病呻吟》等，1748 年苏马罗科夫刊行了从法文版《英国戏剧》（1745）中翻译的莎士比亚《哈姆莱特》<sup>②</sup>。即使在 1750 ~ 1760 年代，罗蒙诺索夫和德裔俄国史学家穆勒（Gerhard Müller）的学术翻译在科学院杂志《职员教益和娱乐月刊》（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е,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后该刊更名为《职员教益和娱乐作品和翻译》月刊（Сочин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与 1759 年创刊的《享用节日时光》（Праздное время в пользу употребленное）一样，皆不限于刊载所谓高雅文学、严肃论文，还发表滑稽有趣的轻松读物，科学院印刷厂也不拒绝印行这类图书。法国平民作家勒萨日（Alain Lesage）的《吉尔布拉斯历险记》、小型喜剧和古典主义诗学格格不入，包括理查森、伏尔泰、卢梭、斯特恩、歌德等等创作的畅销作品被古典主义诗人苏马罗科夫不友善地贬损，并引发 18 世纪 50 ~ 60 年代关于翻译文学以及叙事体文学的激烈争论，但这些译作强有力地吸引着青年读者，从而促成了俄国作家和读者接受这种文类，为小说文体在俄国得以确立提供了消费市场<sup>③</sup>。回首历史，这类文学翻译在 18 世纪俄国出现是极有意义的。按现任普希金之家学术委员会秘书柯思金博士所说，18 世纪 60 年代俄国受过教育的贵族能够书写和阅读俄语的约 70% ~ 80%，并非每位贵族皆意识到教育子女学外语的重要性，到 18 世纪末很多贵族仍不能流利使用一门外语，18 世纪 90 年代末在卡卢加的拉季舍夫只能通过莫斯科预定外文书，外语书交易只是在首都进行，但 18 世纪 70 年代俄国却出现这样的奇观——出版商聘任按日计工资的文学翻译（译者名字不出现在译作的封面和扉页上），有时出版商本人亲自上场翻译，如卡拉姆津本人就翻译《奥地利玛利亚·忒列济雅和我们皇后伊

① Левин Ю. 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ереводн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18 века.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5, С. 87.

② Булаков А. С. Раннее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Шекспиром в России // Театраль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б. 1. М.: , 1934, С. 49.

③ Благой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 века. М.: Учебно –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 1955, С. 366 – 367.

丽莎白在叶丽塞田野上的谈话》这样的畅销书<sup>①</sup>。可见，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世俗化审美需求，翻译、出版和阅读欧洲流行文本也就成为一种社会潮流。

## 二

奇异的是，翻译通俗文学之势引起苏马罗科夫和赫拉斯科夫等古典主义者在《勤劳的蜜蜂》杂志上公开反对，翻译之重要性当时尚未充分显示出来——靠翻译难以养家糊口，很少有职业翻译家。但回首历史则发现，后来被视为18世纪的著名知识分子大多曾投入过翻译。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从德、法和意等文翻译当时欧洲流行的戏剧、小说，如1730年代从法文翻译了塔里曼色情性讽喻小说《爱情岛之旅》、莫里哀《贵族迷》，1752年从拉丁文翻译了古罗马作家泰伦提乌斯《阉奴》，1765年翻译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等。俄国著名作家和哲学家博洛托夫（А. Болотов）17岁从军，在业余时间就尝试翻译，在立陶宛服役期间就痴迷于小说《英国哲学家，又名克利夫兰先生的克伦威尔私生子传奇》（1732～1739），虽然这是不完全译本，却畅销一时——第一个完整译本出自波罗辛内（С. А. Порошинный）并于1760年刊行，1762年退役后仍热衷翻译，在畅销杂志《农村生活》和《经济杂志》上常发表译作。波波夫斯基（Н. Поповский）作为罗蒙诺索夫所赏识的学生，1756年被老师邀请任莫斯科大学修辞学教授，在老师建议下，翻译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诗篇《人论》（Опыт о человеке，1757），1759～1760年从法文翻译英格兰思想家洛克《关于教育的若干思考》（1693），把蒲柏（Alexander Pope）《荣耀教堂：一种美景》（The Temple of Fame: A Vision，1717）俄译为《荣耀教堂》（1761），1763年出色俄译《艾洛伊莎致阿伯拉尔》（Eloisa to Abelard，1717）。就这样，出现了古科夫斯基所列举的翻译流行文学之繁荣情形。拉塞佩德（Pierre de Lacépède）在欧洲广为流行的传奇《巴黎与维也纳》（Paris et Vienne）被俄译成诗体小说《巴黎和维也纳的历史传说》。1725年，苏格兰著名作家巴克莱（John Barclay）用拉丁文书写的讽喻性政治小说《阿赫尼斯》（1621年，这部欧洲畅销书，到18世纪初被各国重版达52次之多），被当时是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生的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所俄译，并畅销一时，译者日后哪怕声名赫赫，但仍于1751年重译之。18世纪50～70

<sup>①</sup> Андрей Костин, Массовое чтение в XVIII веке // Курс, №19, 2015

年代，法国著名作家兰伯特（Claude Lambert）《雅雯公主、墨西哥皇后的传奇》和《贞洁的西西里岛少女之生活，又名女侯爵阿贝尔的历险记》先后于1765、1767年俄译刊行（1788、1794年分别再版）。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里克伯尼（Par Riccoboni）之作《安格尔西伯爵夫人传奇》（1764）被俄译成《恋爱的荒谬，又名安格尔西伯爵夫人历险记》。库德里亚夫采夫（И. Кудрявцев）从法文翻译《尤利西斯在艾尤岛历险记》（1752），1763年哈尔拉莫夫翻译匿名的《英国孤儿，又名夏洛特·苏美尔西传奇，幸运的教区姑娘》——实为法国作家普拉斯（Pierre - Antoine de La Place）所创作的传奇（1751），它们与那些译者或作者不详之作，如《声望赫赫的土耳其皇帝艳史，他是攻占君士坦丁堡的默罕默德二世》《可怜的情人，又名克米纳热伯爵的真实历险故事》《新帕美拉，又名对玛利亚传奇的公正描写，她是一位名媛》《第二个坎迪德，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又名真理的朋友》《新东方故事集，来自凯鲁西伯爵的作品》《赛里木和达马欣娜：非洲故事》等等一样（多未能进入公共图书馆），深得彼得堡和莫斯科及西伯利亚的贵族、商人及其子女的青睐。他们痴迷于其中的罗曼蒂克、多愁善感、趣味横生的情节，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少贵族文人也以阅读和保存它们为时尚<sup>①</sup>。

城市化进程的后果超越了官方的预期，那些有助于培养贵族气质的古典主义文学艺术得到体制的倡导，而加剧世俗化的欧洲流行之思想和文学，则随出版业之发达，广泛畅销于俄国。而官方极力推崇的古典主义戏剧和颂诗，未能主导俄国城市化的文学市场，并且影响力越来越不及历险记、书信体小说、日记体小说等畅销书，不少是经有法文俄译来的欧洲流行小说。这种意外结果是皇室趣味、社会潮流共同促成的。

本来，随着莫斯科大公国加速统一周边公国而成为沙俄，并日益扩张，导致无论是从地缘政治上还是皇室的自我更新上，都必须和欧洲发生越来越多的关系，皇室就以和欧洲通婚方式密切包括法国宫廷在内的欧洲上层关系，皇室主要成员普遍会讲欧洲语言尤其是法文。从彼得一世开始，皇室和欧洲上流社会关系溢出到社会，出现俄国史学家和翻译家别佐布拉佐夫所说的情形，“法国对俄国的文化影响，正是起源于彼得大帝时代，但当时法文、法语书籍、法国教师尚未时髦起来，一般而言，对俄国影响的主流是德国的、荷兰的和英国的，因为彼得

<sup>①</sup> Баренбаум И. Е.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переводная книга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веке. М. : Наука, 2006, С. 60.

大帝个人趣味并不倾向于法兰西”，阅读法文的读者甚少，法国文献的俄译更少，甚至1708~1724年间俄国只刊行《海战及军械库之条令》（1715）等8部译自法文的实用之作，这和科学院绝大多数科学家很少有来自法国的情形一样（多从德国延聘专家）。即便如此，连皇太子阿里克谢也出色地掌握法语；1722~1723年以降，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学哲学和数学的格尔里茨基（И. Горлицкий）等一批留学生学成回到帝俄，以及科学院越来越多地接纳来自法国的化学家、艺术家、雕塑家、建筑师和工程师等，促成了知识精英正面对待法国文化。这种趋势，在彼得大帝去世（1825）之后，因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并波及贵族地位、农民处境、庄园制度、村社等存在，科学和教育中的法国化趋势相应的得到强化，尤其是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统治时期，法语文献被俄国科学界频繁借用，法语和法国知识越来越变成各层面俄语教育资源，如此情势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有增无减<sup>①</sup>。

更重要的是，自彼得一世改革伊始，就尝试通过政策鼓励懂法文的人译介有关法国的书籍，以帮助精英阶层了解法国的社会结构、居民日常生活和道德标准、政治、法律、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风俗等。这种情形此后成为潮流。和法国关系密切的康捷米尔先后被任命为驻英、驻法大使，更有机会积极向彼得堡介绍当时欧洲尤其是法国文化。1743年，国家商业委员会主任尤苏波夫（Б. Юсупов）公爵委托科学院秘书沃尔奇科夫（Сергей Волчков）引进法国路易十四时代海关督察布鲁伦（Jaques des Bruslons）主编的《综合商业词典》（1723~1730），科学院任命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主译，1847年出版。越来越多的印刷所创建起来，客观上推动了俄国图书出版和贸易活动，刺激了更多人投身于对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欧洲文学之翻译，尤其是在女皇伊丽莎白时代。她本人虽不满伏尔泰反宗教和不去教堂做礼拜的行为，但她强化俄法文化联系，1745年聘伏尔泰入帝俄任职，1746年同意伏尔泰任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748年御准伏尔泰《彼得大帝趣闻轶事》问世，1757年任命伏尔泰为俄国官方史学家，并授权他写彼得大帝史（1763年他完成两卷本《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历史》）。如此情形渐成大势，叶卡捷琳娜大帝有意识推崇亲法风尚（Francophil/Галлонство），进一步加剧皇室和政界对法国文学艺术、思想的兴趣。1767年莫斯科大学印刷所刊行狄德罗《百科全书》俄译本，国务活动家叶拉金（И. Елагин）于1756~

<sup>①</sup> Безобразов П. В. Основаниях России с Францией. М. :, 1892, С. 92 - 93.

1765年翻译法国小说家和史学家普雷沃（Antoine Francois Prévost）《一个仍然活着的高贵人物的回忆录和历险记》（1728~1731），并成为俄译欧洲新文艺的庇护者，建立译介欧洲流行图书的同仁圈，秘书冯维津（Д. Фонвизин）和卢金（В. Лукин）等是成员，他们从法文翻译法国和英国启蒙主义小说，如狄德罗剧作《爱子女的父亲》《私生子》、伏尔泰《苏格兰人：得到奖赏的好人》、法国著名作家阿诺（François - Thomas - Marie de Baculard d'Arnaud）的感伤主义之作《不幸的情人们》（1764）等。其中，冯维津受过良好教育，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时，就把法国神父作家特拉森（Jean Terrason）的政治讽喻小说《塞索斯传奇：来自古埃及人的私下记忆》译成道德小说《英雄美德，又名埃及皇帝塞索斯传奇》，并在译序中称，“关心道德改善可能是有益的”，认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地理因素<sup>①</sup>。他在叶拉金办公室工作期间，翻译伏尔泰悲剧《阿里兹拉抑或美国人》（1736）等，把法国作家巴尔泰莱米（Jean - Jacques Barthélemy）小说《波利多尔的恋情》（1760）及时译成《卡里特和波利多尔之恋》（1763）——有诸多性心理描写的感伤主义爱情历险记，1780年翻译阿诺《一个英国故事，西德尼和西里，又名善举和感恩》（1769）。因受益于俄译法国文学，冯维津创作了反映俄国日常生活的《克利翁》（1764）、《工长》（1766~1769）和《纨绔子弟》（1783）等感伤主义剧作，车尔尼雪夫斯基赞许后两部乃出色喜剧<sup>②</sup>。而卢金通法文、德文和拉丁文，1756年开始发表普雷沃《G伯爵历险记》之俄译（分六卷，历时三年出齐），1764~1765年合集出版。这些翻译，并非出于经济利益动机，乃因组织者的伟大理想之激励；此举也非是满足于贵族的古典主义美学，而是试图提供新的审美标准，并相信俄译欧洲尤其是法国流行文学会提升俄国阅读水平。

皇室和上流社会对法国时尚的热衷转换为国家战略，促成自18世纪40年代后，由原来主要借助德国的近代化成果转向借力法国，致使法国启蒙主义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成为流行思潮而大规模盛行于俄国。在这种情形下，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1725~1800年间俄国出版图书8956种，包括大量法国文学和哲学的俄译本，以及经由法语而俄译的欧洲其他文学作品，而1750~1800年俄译法国书籍达1400种，约占全部图书六分之一，既包括

<sup>①</sup> Фонвизин Д. Соб. соч. М. - Л. : Гослитгиздат, 1959, С. 221 - 222.

<sup>②</sup> Кокорев А. В.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8 века. М. : гос уч. - пед. изда. мин. прос. РСФСР, 1961, С. 296.

实用性的，也有文学艺术和哲学的<sup>①</sup>。这一过程本身，包含推动俄国宫廷内外皆热心于法国文学艺术，使得当时法国流行的文学艺术也随着古典主义一并进入俄国，“法国文学和凡尔赛的成见一道，相随而至俄国并流行起来，俄国上流社会对古典主义作家烂熟于心，并认为路易十四时代要高于其他时代。一些阔太兴奋阅读神父马西隆（Jean Batist Massillon）等人作品，这些作家已接受天主教洗礼，却放荡不羁，倡导无神论，崇拜伏尔泰和狄德罗，其作品不乏贵族青年男女的多愁善感，在法国上流社会看来是另类；但是，俄国许多人沉迷于法国这些不入流作家的言情诗、不登大雅之堂的滑稽作品”<sup>②</sup>。与之类似，苏马罗科夫及其同道者激烈反对伏尔泰及其《查第格》，但伏尔泰思想及其饱受争议的小说，却得到俄国读者的广泛接纳。这类流行文学对新兴的俄国市民阶层，普遍具有吸引力，帝俄科学院院士维谢洛夫斯基（А. Веселовский）在《西方对新俄罗斯文学之影响》（1896）中就大量论及18世纪俄译法国文学及其对俄国现代审美之生成的积极影响。

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懂外语的人士投身于文坛，就不是如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和杰尔查文等贵族作家创作古典主义的戏剧、诗歌那样，而是翻译欧洲流行作品。除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冯维津、卢金和下文要重点论述的楚尔科夫、艾明父子、波格丹诺维奇等之外，还有来自图拉贵族之家的博洛托夫，在中学生时就听从老师要求去阅读法文版费奈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虽然当时他未充分掌握法语，但这促成他立志成为法国文学翻译家，此后翻译许多法国文学作品。著名剧作家杰·冯维津之弟巴维尔·冯维津（П. Фонвизин），翻译了马蒙泰尔（Jean - François Marmontel）的12篇故事组成的《道德教喻故事集》（1761）。这部体现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思想的故事集，在当时俄国畅销一时，两年后再版，第三版扩充到三卷本（达23篇）。出生于雅罗斯拉夫商人之家的波波夫（Михайл Попов）翻译有费奈隆《特勒马科斯历险记》（1766）、伏尔泰《瓦加的故事》（1771）、塔索《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1772）和《一千零一夜》（1778）等，并受益于对欧洲流行的民间文学之翻译，创作了《斯拉夫古迹，又名斯拉夫大公历险记》（1770~1771）和《俄国的厄拉塔，又名最优秀俄罗斯歌曲选》（1790~1792）等俄罗斯民间文学。色情诗人和翻译家巴尔科夫（И. Барков），甚至古典主义剧作家科尼亚日宁、科学院院士尼科列夫（Н.

① Баренбаум И. Е.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переводная книга в России в XVIII веке. М. : Наука, 2006, С. 95.

② Вигель Ф. Ф. Записки (Ч. 1) . М. : Круг, 1928, С. 148.

Николев)、出生于乌克兰的著名诗人和剧作家卡皮尼斯特 (В. Капнист)、通讯院士和诗人赫穆尼采尔 (И. Хемницер)、讽刺诗人奥西波夫 (Н. Осипов) 等, 不同程度地翻译过法国流行文学作品, 并由此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在这样的情形下, 当时法国流行小说几乎悉数被俄译, 以至于在法国流行的伏尔泰作品, 在俄国并非作为经典, 而是作为畅销文学被引入的。18 世纪 50 年代, 《每月作品集》《勤劳的蜜蜂》等通俗杂志就刊载伏尔泰作品。《查第格》(1747) 这部以巴比伦青年查第格因智慧超群, 在东方诸国屡遭不幸, 最终获得真正爱情并成为国王的历险记, 于 1759 年被《员工寓教于乐之创作与翻译》月刊所发表。1765 年, 海军学校校长格列尼舍夫 - 库图佐夫 (И. Голенищев - Кутузов) 重译《查第格, 又名命运, 东方小说》。波格丹诺维奇翻译了伏尔泰《里斯本地震》, 把他的《苏格兰格子呢》(1760) 俄译成《自由之屋, 又名苏格兰少女》(1763), 足见译者对原作的启蒙主义美学之热望, 《四十金币的人》(1768) 问世两年后被及时俄译 (1770), 并深受俄国读者青睐——两次重印 (1785、1792)。苏马罗科夫翻译了其《扎伊尔》(1732) 等流行悲剧。1769 年, 彼得堡科学院专家巴什洛夫 (С. Башилов) 翻译出版《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 也就是最明亮之光》(1759), 这是翻译家“会议”第一部译作, 以后四次再版。《巴比伦公主》(1768) 问世两年后, 就被波鲁宁 (Ф. Полунин) 俄译出版, 并且于 1781、1788、1789 年再版。《一位善良的婆罗门故事》(1759) 和《斯卡门塔多的旅行传奇》(1756) 于 1772、1773 年俄译, 三次再版。伏尔泰去世, 俄国兴起刊行其作品热, 如《善良的婆罗门故事》《默罕默德》等合集 (1783)、《伏尔泰讽喻、哲学和批评文集》(1784)、三卷本《伏尔泰文集》(1785 ~ 1789) 等。这些俄译伏尔泰作品及其流行的意义非同小可, 如思想家德米特里耶夫回忆说, “在上个世纪末, 我们就满怀享受地阅读着伏尔泰的全部译作”<sup>①</sup>, 促成法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广泛传播。

### 三

不过, 对俄国影响最大的 18 世纪法国文学家, 在苏联科学院院士洛特曼看

---

<sup>①</sup> Дмитриев М. А. Мелочи из запаса моей памяти. М., 1869, С. 49.



来，当属卢梭，他认为这种趋势从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显露出来<sup>①</sup>。卢梭的创作公开挑战当时欧洲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等基本认知，如《忏悔录》把耶稣基督和苏格拉底神学思想相比较，因此其作品及其思想在法国、瑞士等国被查禁，在俄国也被禁止。176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致函总检察长格列波夫（А. Глебов）说，“我听说，科学院在销售有违法律、敌视道德、破坏我们俄罗斯国家的图书，这些书在全社会是要被禁止的，如卢梭的《爱弥儿》之类法国作品”<sup>②</sup>。按女皇所说，卢梭违法和敌视道德之作还有批评现代文明的《忏悔录》和宣传回归原始教育的作品，“我特别不喜欢爱弥儿的教育；在我们过去的纯良时代，思考的是另一回事，但说现在我们有些人被憋死了，由此我要问责这一结果”<sup>③</sup>。不过，书刊审查制度无论怎样严厉，但阻挡不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带来出版业的繁荣，从而使禁令收效甚微。1762年莫斯科大学德裔教授赖克尔（Иоганн Рейхель/Johann Reichel）翻译《卢梭先生致伏尔泰先生的信》，1768年莫斯科大学杂志《论断》（Рассуждение）刊行卢梭《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有助于敦风化俗还是败坏道德？》（1740）。这些流行译作使俄国读者知晓了卢梭启蒙主义思想，但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则是那些广泛流行的俄译文学作品。后来成为著名将领和伯爵的波将金（П. Потемкин），在青年时代先后翻译了《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有助于敦化风俗还是败坏道德？》（1768）、《新爱洛依丝，又名一对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小城的情人信札》第一卷（1769年，第二卷由彼得·安德烈耶夫1792~1793年翻译出版）、《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起源和基础》（1770）。即使叶卡捷琳娜大帝严查卢梭思想时期，彼得堡仍刊行《忏悔录》片段《对上帝的、上帝思想、人的思考》（1769~1770）。卢梭去世（1778）后，《彼得堡公报》（8月7号）和《莫斯科公报》（8月25号）发表诸多纪念卢梭的文字，或涉及《忏悔录》有关内容，或触及他的教育思想，或论述阅读《爱弥儿》，“可以变得智慧起来、心灵向善、强身固体”<sup>④</sup>，莫斯科大学印刷所趁机刊行《爱弥儿与索菲亚，又名出色的有教养的情人们：卢梭作品集》。这样一来，翻译卢梭作品在俄国渐呈常态，如1779年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不久的斯特拉霍夫

① Лотман Ю. 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вяз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 1967, С. 208 - 281.

②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7. СПб.: 1871, С. 318.

③ Сбор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3. СПб.: 1874, С. 37.

④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7 авг. 1778, № 63, С. 550.

(П. Страхов), 就翻译了《爱弥儿》部分章节《爱弥儿和索菲亚, 又名很有教养的情人, 卢梭作品》; 1782年苏马罗科夫的力作《论人生来是为善还是为恶?》(1782), 大量触及卢梭哲学; 1787年马林诺夫斯基(А. Малиновский)这位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古文献学家, 把《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俄译成《对公民社会的起源和基础之思考》; 1797年波特金翻译出版《卢梭这位实实在在的人, 未婚同居者的忏悔录》(节译《忏悔录》前六章。其实, 1782年《忏悔录》第二部分于日内瓦出版, 直到1865年才有俄译本, 虽然期间俄国常提及该作); 早已是战功赫赫的波将金还刊行《卢梭与伏尔泰〈默罕默德〉》(1798); 1801年, 彼得堡刊行了俄译本《爱弥儿》删节版《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 著名文集《社会契约论》刊行了俄译文章《卢梭的加尔文哲学思想》, 第二年彼得堡刊行俄译本《忏悔录》删节版《第十一次散步》(1822年再版); 紧接着, 《精神, 又名卢梭所选择的思想》(1804年初版, 1825年再版)也被翻译<sup>①</sup>……此后俄国讨论卢梭浪潮就未曾停止过, 不管审查制度多么严格, 1903年出版了《忏悔录》相对完整的俄译本(《一位牧师的真诚忏悔》), 1908年在《论上帝》之名下刊行了《忏悔录》完整版。广泛翻译卢梭作品, 在洛特曼看来, 导致卢梭思想在俄国广泛流行, 如卡拉姆津《我的忏悔》延续卢梭《爱弥儿》思想, 声称“眼下这个世纪可以称之为开诚布公的时代……我想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活着、思考着”, 其主人公是一位教育家, 本身就是卢梭的老乡, 自称“我出生于共和制国家, 憎恨其横行霸道”<sup>②</sup>。当然, 卡拉姆津对卢梭很矛盾, 一方面公开反对卢梭舍弃人类文明、要使人回归大自然而成为自然人的观念, 声称不相信人就其本性、所理解的自然概念就能奠定其道德根基, 确信道德、宗教、民俗和家庭纽带等是人注定要面对的, 也是有益的, 否则就生活在寂寞中; 另一方面他在《致德米特里耶夫信》(1797)中却深情回忆被卢梭思想所震惊的情形, “新时代, 正在到来, 我看到了, 但卢梭预言到了。您阅读《爱弥儿》中的一条注解, 激动得书从手中跌落了”<sup>③</sup>。无独有偶, 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的利沃夫(П. Львов), 其《俄国的帕梅拉》(1789~1794)也记录类似情形: 主人公叶夫根尼娅是贵族少女, 阅读的书就是《新爱洛依丝》, 她感慨卢梭之作写得那样温柔,

① Чтения одед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ека. Выпуск 7. М. И СПб. : Альянс – Архео, 2013, С. 244 – 251.

② Карамзин Н. М. Соч. Соч. Т. III. СПб, 1848, С. 504, 506.

③ Лотман Ю. М.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М. : ОГИ, 2000, С. 197.

“难以名状的忧伤，在心中时时涌现”，“每个词皆叩击我的心房”<sup>①</sup>。对卢梭的热诚还使诺维科夫在1780年就去翻译匿名的法语作品《亨丽塔德沃尔玛尔，又名嫉妒亲生女儿之母，效仿卢梭先生〈新爱洛依丝〉的真事》（1768），并盛赞《新爱洛依丝》乃当时最有智慧之作。这些译介对卢梭在俄国盛名不衰起了重大作用，如费多尔·艾明的《厄内斯特与多拉福尔信札》（1766~1768）有明显的《新爱洛依丝》痕迹，而尼古拉·艾明《命运游戏》中的主人公普列尼尔致恋人信札，则仿造《新爱洛依丝》主人公的修辞。德米特里耶夫回忆到，“1788年在参加和瑞典作战的过程中，我还翻译《新爱洛依丝》中的书信部分”<sup>②</sup>。可见，卢梭在18世纪中后期就已深入到俄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当然，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伏尔泰和卢梭等人作品在俄国广泛流行，得力于此前对法国流行文学的大量翻译，尤其是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翻译的塔里曼之作《爱情岛之旅》、许多著名文化名人都翻译费奈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和勒萨日《吉尔布拉斯历险记》等。

1730年俄译《爱情岛之旅》刊行，乃俄国首部世俗性的文学作品，“第一次挑战了古罗斯禁欲主义传统，这正是它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所在”<sup>③</sup>。它出自后来被誉为现代俄语诗学奠基人的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他本是出生于阿斯特拉罕一神父家庭的外省人，20岁时赴当时俄国最高学府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读书，两年后（1727）被选派到荷兰去学法语，又得到帝俄驻荷兰大使重视，保荐到巴黎大学学习法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1730年回国后得到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重视，当即开始翻译塔里曼色情性讽喻小说《爱情岛之旅》（1663）。《爱情岛之旅》形式复杂，生动展示主人公提尔西斯（Thyrsis）和阿敏塔（Aminta）这对恋人的爱情历险，叙述者经常出场、广泛引用诗歌、穿插书信和短篇故事等不同文体，并有大量寓言性人物——“荣誉”“责任”“尊严”“羞愧”“神秘”“冷漠”等活跃在叙述过程中，主人公的爱情体验被寓言性地描写成漫游于“惨烈的山洞”“记忆的荒漠”“希望之城”“无情之地”“富饶城堡”“拒绝之门”“丑恶之湖”等爱情岛上的神秘之地。在这些地方，读者深切体会到“纯洁爱情在女性那里是存在的”、“反复无常的女孩”、“男女情人分离之忧愁”等。提尔西斯长期寻找心仪的阿敏塔，漫游于爱情岛这个神秘、封闭的

① Павел Львов, Сочинение собрания. Ч. 2. СПб., 1789, С. 69 – 70.

② Дмитриев И. Сочинения. Т. 2. СПб., 1893, С. 33.

③ Благой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 века. С. 120.

世界，经历各种体验，学会对女性的尊重，离奇地进入了对方的感情世界，而多情的阿敏塔，其命运和意志所及的任何地方，皆寓意性地体现了温柔的情感。这些爱情的描写，包括“爱情哲学”、神圣爱情的伟大力量、爱情不仅是心理的激动也是身体感觉本身，对当时读者而言，是极为新鲜、闻所未闻的。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满怀崇高目的翻译该作，在他看来，“因我们通行的斯拉夫语言乃教会语言，而这部书是世俗题材；在我们这个世纪，斯拉夫语言是幽暗不明的，我们阅读这类世俗性语言书写的书，大多深感陌生，而该作叙述温柔的爱情，明白易懂，也非常轻松、重要，目前我对斯拉夫语言极为敏感，我不仅用这种语言创作并且和大家讨论这种语言，虽然此举显示出我很愚蠢，我似乎还未掌握我们语言的实质，为了掌握它，我就只能夸奖之”<sup>①</sup>。由此，为把这部在田园牧歌中展示世俗爱情之神奇的魅力传达出来，《爱情岛之旅》译者序言坦陈，“我不是创造者吗？是的，我只是翻译了它；但译者和作者只是在名称上有差别而已。我还想说：若说作者极为复杂奇妙，那么译者则更为复杂奇妙”，主张不是把该作当作普通商品去推销，而是以责任感和并非吹牛地姿态对待该作<sup>②</sup>。

《爱情岛之旅》乃17世纪描写优雅的田园生活的历史—幻想—讽喻小说，是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津津乐道的典范之作。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率先俄译，则因他在观念上与追求世俗化的康捷米尔相一致（后者热衷于推动欧洲世俗化思想，曾翻译拉封丹反对教权主义、倡导日心说的《关于世界多元化的谈话》），自认为和康捷米尔同道。该俄译本风行一时——青年贵族近乎人手一册——激发了他们亲法国贵族生活风尚、对肉体爱情的热望，也使教会甚为忧虑，对传统的旧礼仪派打击更甚，以至于教会谴责他不正派、无神论。由此，该作成为当时俄国启蒙主义文学力作。也正因如此，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译作意义巨大。就现实层面而言，译作问世翌年（1731）二月，曾任彼得堡图书馆医学部主管、时任彼得堡科学院首任院长的舒马赫尔（Johann Daniel Schumacher），致函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说，“我高兴您的译作取得成功，那些有脑子的读者不仅喜欢上您，而且也爱及我们。我要郑重地重申，新的诗歌和音乐会使我们的性情变得柔和起来，此后那些领受这方面熏陶者会从中汲取益处”<sup>③</sup>。译者作为第一位杰出的俄罗斯翻译家，由此获科学院专职翻译岗位、1745年升任科学院教授。就精神作用而

① Гуковский Гр.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I века. Хрестомати.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 Худ. Лит. 1937, С. xiii

② Езда в остров Любви. К читателю. Соч., т. III, 1730, С. 648 – 649.

③ Пекарский П. П. Истор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 2. СПб., 1873, С. 25 – 26.

言，它通过革新俄语而有效输入新观念，推动了社会进步。“《爱情岛之旅》首次严肃且系统地拒绝了教会斯拉夫语，口语化的俄语作为书写世俗题材之作的语言；首次把爱情作为文学主题向俄国人介绍；用俄语书写的抒情诗，被典型化为俄语之歌；其翻译，把欧洲的小说这种文类作为严肃的俄罗斯文学输入到俄国”<sup>①</sup>。这也就意味着该作在俄译文学史，甚至整个俄国语言文学史上皆占有重要位：“俄国第一部世俗文学译作，译者把拉丁文和法文诗歌融为一体，以至于女皇安娜·伊凡诺夫娜自豪地祝贺道，‘这是《洪堡歌集》在俄国的第一乐章’”<sup>②</sup>。该作问世20年后，女性被限于家庭事务的传统开始被打破，伊丽莎白女皇御令女性可以参与公共聚会，在公共场合和丈夫平等讨论问题。对俄语诗学的作用，按布拉戈（1945）所说，“译者深谙法语温文尔雅爱情诗歌的风格和范式，试图给俄语提供这方面案例。但俄语诗律不能满足这样的诗学：用法语诗歌风格则破坏了俄语爱情诗”，他被迫在用俄语诗歌翻译法文诗时寻找另一种诗学形式，对比俄语和法语文本，明显看出当时俄语书面语的粗糙，产生要改革俄语诗学和俄语标准语的愿望，“翻译《爱情岛之旅》是要改造标准语”<sup>③</sup>。正是基于这一翻译实践和从拉丁、法、德、意大利等文翻译文学作品的阅历，他得以深究俄语诗学问题，写下《俄国诗歌之形成的复杂方式》《诗歌的一般性原则》《论俄国古代、中期和近期诗歌》等力作。此外，此译作肇始了他把翻译流行文学当作正当事业，而非一时兴起或经济利益考虑。即便此后声望赫赫，1749~1751年他仍从拉丁文翻译巴克莱的《阿赫尼斯》、从法文翻译费奈隆诗体《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等，并视之为伟大的启蒙事业之一部分。

论及《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科学院院士奥尔洛夫（А. Орлов）认为，第一部俄语长篇小说译本（手抄本）不是《爱情岛之旅》，而是四年后刊行的俄译法国大主教和路易十四之孙的老师—古典主义作家费奈隆（François Fénelon）所秘密出版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叶卡捷琳娜大帝支持俄译该作，俄国许多文学家投身于对其翻译<sup>④</sup>。此为作者任太傅期间所著，取材于荷马史诗《奥

<sup>①</sup> William Edward Brown, *A History of 18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Ann Arbor, Michigan: Ardis, 1980, p. 72.

<sup>②</sup> Быкова Т. А. Книгопечат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о 2 - ой четверти 18 века. // Книг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61, №4, С. 242 - 243.

<sup>③</sup> Дмитрий Глаго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 века*. С. 118 - 119.

<sup>④</sup> Александр Орлов, "Тилемахида" В. К. Тредиаковский//XIII век: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М. и Л., 1935, С. 11 - 13.

德赛》的片段——奥德赛在攻破特洛伊城后十年未能回到家中，作品着力描写其子忒勒马科斯在孟铎尔（智慧神化身）引导下寻找父亲的历险记：除地狱这类奇思异想之外，多是叙述沿途所见奇风异俗以及暴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等情形，在这种旅行记中，触及何谓贤明君主——践行法律治国的伟大理想、普及民众福祉、使耕者有其田、鼓励贸易活动等。在这种利用古希腊题材叙述当代政治哲学的讽喻小说中，读者可见识出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糟糕状况，以及唯有遵从基督教原则方可改变的寓意。正因主题敏感，作者不打算及时刊行，但其中一位抄写员自作主张把它印行了。一经问世，在法国就洛阳纸贵，仅1699年就印刷20次，也引起路易十四的愤怒，视之为影射现实，作者由此大祸临头（被撤销太傅和大主教职位，并被幽禁在甘布雷教区）、作品长期被禁（第一版中许多没有来得及销售出去的被查收）。但如此境遇，显示出法国甚至欧洲思想发生从君主专制向启蒙主义转化之趋势，深得欧洲和俄国知识界青睐。1724年，海军部参事赫鲁晓夫因其亲戚沃伦斯基（А. П. Вольтский）公爵喜欢该作，便受命开始翻译，耗时十年完成，题名为《忒勒马科斯父子历险记：费奈隆作品》（1734），伊丽莎白女皇御令帝俄科学院印刷所刊行，1747年首版1225册，该译作得到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重视。它以历险记方式呈现国家乌托邦之可笑性，“译作显示出很高的俄语水平，读者从中甚至可以看到译者对风格的追求。其节奏，令人想起后来的卡拉姆津小说”，虽然其中保留了大量未译出的外来语，是因在彼得一世时代及此后岁月，尚未找到对应的语汇<sup>①</sup>。有意思的是，罗蒙诺索夫《修辞学》（1748）明确表达了对原作的赞赏，“所谓中篇小说大篇幅描写了某些事情，包括关于政治、美德的案例和学说：巴克莱《阿赫尼斯》和费奈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就是这样”<sup>②</sup>，因而也曾译过该作，可惜未能流传下来<sup>③</sup>。杰尔查文（Г. Державин）在1762~1766年间也翻译了其中的若干诗篇。这些译作在俄国广为畅销，甚至于1761~1762年出现了匿名译者所译的兰伯特（Claude Francois Lambert）之作《新忒勒马科斯，又名某伯爵父子旅行记和历险记》（1744），足见费奈隆在俄国的魅力。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Орлов, "Тилемахида" В. К. Тредиаковского, С. 15.

② Гуковский Г. и Десницкий В. 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0 томах. Т. III.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I века. Ч. 1. М. / Л.: АН СССР. 1941, С. 246.

③ Бабкин Д. С.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Ломоносова (Перевод глав из романа Фенелона "Полождения Телемака") //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4, № 4. С. 100 – 115.

当然，最流行的俄译本是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译本《忒勒马科斯，又名奥德修斯之子忒勒马科斯的漫游》（1766）。当时他已声望赫赫，看到既有译本不足以呈现俄语魅力，便要推出把书面语和口语有机融合、不同人物语言表达有差别之译作，诚如其译作序称，“众所周知，我们的俄译本《忒勒马科斯》对所有读者而言极为必要，因作者以其智慧真诚地启蒙我们，真心矫正我们，给阅读该作的不同读者以享乐，哪怕那些学富五车的读者，也会看到我们这个译本有诸多不足”<sup>①</sup>。的确，他尽力用简明俄语翻译该作，在语言上贴近市民趣味，哪怕叶卡捷琳娜大帝对此不满——在杂志《各式各样的东西》上刊文嘲讽该译本的平庸，却不妨碍它广为畅销，甚至加速重印，哪怕装帧和印刷有错误，还供不应求，甚至冯维津《纨绔子弟》中女主人公索菲亚拿的那本书就是该译本。这就造成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遗产中，“翻译和原创性创作密不可分。其同时代读者所知道的特列季亚科夫斯基，首先正是翻译家”<sup>②</sup>。此后重译该作不断：1786年枢密院议员扎哈洛夫（И. Захаров）、1781~1789年贵族陆军学校教师热列兹尼科夫（П. Железников）、1797~1800年枢密院议员卢比扬诺夫斯基（Ф. Лубяновский）等分别推出新译本，并且都很销。

这部作品在俄国鹤立鸡群，按苏联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所说，首先乃因原作的艺术成就，“它成功地叙述了古代国家，重新讲述了古希腊神话，以多样方式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丰富了细节、增添了热情。情节的趣味性和语言的灵活生动性，导致该作甚至成为儿童文学作品”<sup>③</sup>。它被俄译成《忒勒马科斯父子历险记》，在希波夫斯基看来，肇始了俄罗斯长篇小说，自此到18世纪末，法国思想家的话语及其关乎启蒙主义思想之先驱，被视为是卢梭及其继承者的政治乌托邦一部分<sup>④</sup>。该作多种俄译本之流行，带动了翻译和创作政治小说的盛行：1762年，冯维津把法兰西学院希腊和拉丁哲学教授特拉森（Jean Terrasson）《塞索斯》俄译成《英勇的善者，又名埃及皇太子塞索斯传奇》，凸显主人公作为善者漫游在非洲寻找真理之路上，译作畅销于文坛，“喜欢《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的读

① Третьяковский В. К. Тилемахида или странствия Тилемаха сына Одиссея описанное в составе ироническая пимы Василием Третьяковским. СПб, 1766. Т. I. С. XLVI – XLVII

② Мартынов И. Ф. Третьяковский и его читатели –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тдела рукописей и редкой книги Библиоте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 Венки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му. Волгоград, 1976,

③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 I. М. и Л.: Академия СССР, 1956, С. 578.

④ Сиповский В.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Т. I 18 век.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Т-ва Печ. и Трудь, 1910, С. 396 – 409.

者，一定也会满意这部关于希福的历险记”<sup>①</sup>；1765年，沃尔科夫（А. Волковский）从法文把拉姆塞（Andrew Ramsay）之作《居鲁士之旅，附带有对异教徒的神学和神话之论》（1727），俄译成《新的居鲁士，又名附带有古代神学和神话之谈话的居鲁士之旅》——原作者出生于苏格兰，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后长期用法语写作，和费奈隆相识，创作了类似于《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的该作，叙述主人公青年居鲁士的经历——见识多种社会政体及国家结构的观点，游历好战的斯巴达，观光艺术繁荣的雅典，目睹腓尼基的商业，思考巴勒斯坦的伦理体系，最后确认以民众福祉为最重要的王道国家最为理想。作品感性讨论社会政治乌托邦问题，并以共济会观点看待国家和社会，俄译本深得共济会读者群喜欢。1785年由诺维科夫在莫斯科大学印刷所再版，引发教会怀疑，1787年该作连同诺维科夫刊行的其他出版物被没收，译者被判妖祸读者的江湖术士。

比俄译《特勒马科斯历险记》更畅销的是勒萨日（Alain - René Lesage）的通俗小说《吉尔布拉斯德桑提兰历险记》（1715 ~ 1735）。它很晚才被汉译（1956年初版、1962年再版，杨绛译）。可是，早在1754 ~ 1755年，俄国科学院翻译家捷普洛夫（В. Теплов）就俄译了《吉尔布拉斯·德桑提兰历险记》，畅销一时：1754、1760、1768、1775、1781、1784、1792、1800年科学院印刷所再版，1808、1812、1819年仍继续再版。勒萨日在俄国的声望，随着其西班牙题材小说《有引入发笑的绰号的叶斯特凡尼·冈萨雷斯历险记》（1734）于1765 ~ 1766年被俄译，更加看涨：1767年科学院印刷所刊行勒萨日《魔鬼瘸子》（1709），由科学院大学生列戈伊（Д. Легкой）和莫科耶夫（Д. Е. Мокоев）所译；1775年，匿名西班牙小说《拉扎利洛托儿梅斯的传奇和历险记》被俄译刊行，它乃流浪汉/骗子的历险记《吉尔布拉斯》之先驱，深受俄国读者青睐，却反而被誉为“新吉尔布拉斯”，翻译家格林卡（С. Глинка）《笔记》（1895）云，他和同伴被《新吉尔布拉斯》所强烈吸引，则因广泛流行的勒萨日《吉尔布拉斯》<sup>②</sup>；著名小说家纳列日内（В. Т. Нарезный）称自己最好的作品乃道德讽刺小说《俄国吉尔布拉斯，又名加夫里尔西蒙诺维奇奇斯佳科夫公爵历险记》（1814），1820 ~ 1840年代著名作家布尔加林（Ф. Булгарин）就因勒萨日之影响，创作了又一部畅销书《伊凡·维日金，或俄罗斯的吉尔布拉斯》（1825）。

<sup>①</sup> Собрание лучш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к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знания и к произведению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 М., 1762, Ч. 1. С. 4 - 5.

<sup>②</sup> Глинка С. Н. Записки. СПб., 1895, С. 106.



这类骗子历险记在18世纪中叶以后得到更多俄国读者痴迷，如1782年刊行的俄译本《路易斯·曼德林从出生到去世之传奇，其中有他无恶不作的抢劫和相随之至的死刑犯之描写》（1755），畅销一时。俄译本《吉尔布拉斯》远不只是作为一种畅销书流行于18世纪，其流行过程伴随着该作的俄罗斯化，成就了俄国人关于历险记或流浪汉小说之类通俗文学的美学观<sup>①</sup>。这类被古典主义所批评的低级之作却得到著名作家德米特里耶夫的强烈维护，“阅读这类长篇小说，对我的道德没有负面影响。我甚至能说，它们是我得以克服缺点的解毒剂。1765~1768年刊行的俄译本普雷沃《修道院院长吉列尔》《G伯爵历险记》，提升了我的灵魂。我始终痴迷于善的榜样，热诚追随之”<sup>②</sup>。

远不只是这些人的作品在俄国得到了广泛译介，18世纪法国作家创作的流行文学，不同程度得到俄译，并且越是流行的法国文学，被重译的机会越多。百科全书派作家马蒙泰尔流行小说《道德教喻故事集》（1761），于1763年被外语学院顾问库尔巴托夫（П. Курбагов）及时翻译：以民间讲故事的传统文体，叙述夫妻、父母和孩子如何相处，年轻人教育、爱情产生及其表现形式之类的家庭生活，世俗化的爱情诱惑力则是叙述中心。这种关于当代生活的时尚话题之作，一经刊行，备受读者喜爱：初版15个故事两卷本，1763、1765年两次再版分别增加到18、23个故事。其短篇小说《劳苏斯和利基亚》也于1763年被《自由时间》杂志刊发。伏尔泰的朋友阿诺在1785年之前就有19部作品被俄译，包括冯维津所译的《西德尼和西尼，又名善举与感恩》（1766），且有人模仿该作而作《致我的仆人舒米洛夫、万卡和彼特鲁什卡》。1763年法国作家斯卡龙（Paul Scarron）《滑稽小说》（Roman comique）被杰普洛夫俄译出版；1782年布雷东（Retif de La Bretonne）《私生女》（La fille nautrelle）则由通法文的青年贵族摩尔科夫（И. Морков）俄译成《寻得的女儿，又名父爱》——关于一位父亲不知道和地下情人产下一女儿的感伤主义小说。1780~1781年，刚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斯特拉霍夫，俄译了畅销作家努加雷（Pierre - Jean - Baptiste Nougaret）之力作《一千零一种蠢行》（Les mille et une folies）——风趣幽默地叙述不同圈子和阶层人物的日常生活，期间交织着各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令人忍俊不禁。译者后来出任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教授和校长、科学院通讯院士，戏称翻译该作乃第

<sup>①</sup> See Ronald D. Leblanc, *The Russianization of Gil Blas: A Study in Literary Appropriation*. Columbus, OH: Slavic, 1986.

<sup>②</sup> Дмитриев И. И. Сочинения. Т. 1. СПб, 1893, С. 5.

一千零二种蠢行。

由于崇尚法国的风尚，法文比欧洲其他语言在俄国更具魅力，以至于“英国文学和其他国家作品（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绝大多数是经由法文译本而译成俄文的”<sup>①</sup>。的确，1761年莫斯科大学《教喻小说》杂志，刊行从法文翻译的塞万提斯《两个情人》（les dos doncellas）这部叙述两个漂亮少女不幸爱上同一个青年的故事。六年后，泰伊里斯这位军校的德语教师从法文翻译了《著名拉曼骑士堂吉诃德传奇》（翻译了27章，仅四分之一多），译者很享受这种法文翻译，极力还原原本语体，使译文有强烈的法国风，但降低该骑士所表现出的启蒙意义。1781年哈尔拉莫夫（Е. Харламов）从法文翻译了《堂吉诃德》中所插入的四个小说片段，取名《贝尔西雷斯与西希斯之游历》。由此，关注俄国流行小说问题的文学史家希波夫斯基声言，“若注意到俄罗斯翻译小说，那么我们确信，那些所谓英国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俄国都有出色译本”，甚至外省有阅读能力的读者爱不释手，到18世纪80年代老一代读者还热心历险记时，新一代读者已热衷于感伤主义，如《新爱洛依丝》有俄译本《新爱洛依丝，或者两位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小城里的情人的书信》（1769年初版，1792年再版），《爱弥儿和索菲亚，或者人们的美好回忆》（1779年初版，1800年再版），《卢梭的忏悔，其中描写了其生活中的独特经历》（1797），《青年歌德的激情》（1781年初版，1794、1796、1798年再版）等，尤其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力最大，这些和理查森的《帕美拉，美德获得奖赏》等流行的恋爱小说一道，被当时俄国视为“色情小说”<sup>②</sup>。其中《帕梅拉》这部影响到卢梭《新爱洛依丝》之作，在俄国深受欢迎：希施金（И. Шишкин）在18世纪50年代据1749年法文版而俄译了《帕梅拉》，于1787年由出版商切尔特科夫（П. Чертков）在彼得堡刊行，包括法文版的两封信函——“作者在此惬意而朴素地写了在那些专门知识和教育之书中很少能见到的真理。该作叩击着我们的心房，捕获了我们的理智”，1796年斯摩棱斯克刊行了在希施金译本基础上的修订版，把法文版序言翻译得更为绚丽，“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满怀着对真理的体验和可爱的素朴，写下了在那些专门的劝诫和消遣之作中所罕见的必要内容。作品叩击着我们的心

<sup>①</sup>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ереводн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18 век. Том 1. СПб, 1995, с. 155.

<sup>②</sup> Сиповский В. В.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Т. 1 18 век. СПб. : Типография СПб. Т-ва Печ. И изд Трудь, 1910, с. 396 - 409.

房，滋养着我们的理智”<sup>①</sup>。首版一经刊行，当即引起轰动，第二年就有人把英国作家金伯（Edward Kimber）《门第高贵且富有的少妇玛利亚之真诚回忆录》（1764），俄译成《新帕梅拉，又名对以其美德、地位和产业而著称的玛利亚生平之公正描写》（1788）。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始于彼得一世的城市化是在强盛俄罗斯帝国框架下进行的，希冀按欧洲古典主义方式塑造新城市、改造老城市，在彼得一世及其去世之后的半个世纪内，形成了崇尚欧洲宫廷和上流贵族高雅趣味的美学，在古典主义文学艺术的引进、创作实践和理论建设等方面，成就巨大。但城市化进程使流行文学也一并进入，叙事类文学的翻译、刊行、销售和消费自18世纪30年代以来渐成大势，甚至在西伯利亚考古文献中发现，有许多匿名或署名的道德劝喻小说、历险记和历史演义等，居然散落在这里的小城镇和农村家中<sup>②</sup>。这情形得益于很多有抱负的文化精英参与翻译欧洲流行文学历程，如《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译者扎哈罗夫就说，“赞赏翻译家就必须附带说明，他是自费刊行自己的著作，把它送给国民学校，并且要说清楚不是为了图利”<sup>③</sup>。德米特里耶夫回忆说，“诺维科夫鼓励大学生、神学院学生和神职人员去尝试翻译，自费刊行他们的作品，并支付其满意的稿酬”<sup>④</sup>，诺维科夫支付高稿酬，每页10卢布，而科学院只支付4~8卢布<sup>⑤</sup>。市场化力量、启蒙带来的了解欧洲之大势的渴望，使得译介范围远远突破了官方的限定，那些包含着欧洲尤其是法国审美召唤力的流行文本，也源源不断地经由法文而被引入其中，导致帝俄社会大众的现代审美，居然和上流社会一样亲近法国，只不过亲近的不是法兰西宫廷的古典主义，而是法国社会大众美学，以至于1812年拿破仑战争延及帝俄后，崇尚法国之风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城市中上层仍盛行，社会民主工党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所践行的主张居然和18世纪法国流行的主张相一致，即前者贴近法国大革命思想，后者亲近启蒙运动哲学。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Левин Ю. 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ереводн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18 век. Т. 1 Проза,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1995, С. 259.

② См.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8 мая 1974, С. 5.

③ Зеркало света, 14 мая 1786, Ч. 1, № 15, С. 344.

④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 Сочинения. СПб., 1893, Т. 2, С. 29.

⑤ Мартынов И. Ф.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 Николай Новиков. С. 163 – 170.